



[丹]卡米拉·T.N.索伦森 [丹]约恩·德尔曼 ◎ 主编
王宇辰 ◎ 译



丹麦的中国研究 寻找世界新秩序

DANISH CHINA POLICY
FROM QUESTIONS ABOUT EXPORTS
AND DANISH JOBS TO A NEW WORLD ORDER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世界新秩序：丹麦的中国研究/(丹)卡米拉·
T. N. 索伦森,(丹)约恩·德尔曼主编;王宇辰译. —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
ISBN 978-7-5520-2298-8

I. ①寻… II. ①卡… ②约… ③王… III. ①社会发
展—研究—中国 ②中国经济—经济发展—研究 IV.
①D61 ②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94821 号

寻找世界新秩序：丹麦的中国研究

[丹]卡米拉·T. N. 索伦森、[丹]约恩·德尔曼主编 王宇辰译
责任编辑:章斯睿
封面设计:周清华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sassp@sass.org.cn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新文印刷厂
开 本: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10.75
插 页:1
字 数:113 千字
版 次: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298-8/D·490 定价: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2018年,丹麦和中国将庆祝两国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这一伙伴关系带来了两国国家级和地方政府之间大量的协议和项目。2017年,中国和丹麦政府领导人商定了“中国—丹麦联合工作计划(2017—2020)”,使得伙伴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工作计划中包含近60个双边合作任务和项目的介绍。此外,还有全面贸易、大量双边投资、双边旅游、文化交流、学生交流以及其他教育领域合作,包括在北京的中丹学院。中丹关系在实质上达到了2017—2020年计划中提到的“历史新高”。

从丹麦的角度来看,这一发展是自中国1978—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历史上长期稳定的经贸互动及在华大量的民间参与的结果。许多丹麦人在中国工作,也有许多中国人在丹麦工作,或者他们往返于两国之间学习、经商或体验生活。丹麦对中国的兴趣也体现在对中国知识和语言的兴趣日益增加。最大的两所大学的中文专业和现在的中国学专业已经开设了几十年。中国研究已经渗透到丹麦所有大学的许多学科中。丹麦小学和初中的学生现在也可以学习中文并与中国打交道。

关于这本书的想法起源于 2015 年的哥本哈根大学中国研究学圈,在最近的 15~20 年,它已经发展成为丹麦最大的从事中国相关研究和教育的基地,仅中国研究系就有众多员工以及约 200 名学生。哥本哈根大学还设立了“考虑中国”(ThinkChina.dk)的智库,以加强学校与中国相关的工作。

本书背后的想法是从科研角度来研究和阐明在我们看来独具特色的丹中合作,同时加入一些实际的案例来说明合作的手段和工具。一些作者来自高校科研界,而另一些则是从业者。每个人在研究中国、撰写中国相关内容或与中国合作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

这本书最初在 2016 年以丹麦有影响力的杂志《经济与政治》的特刊的形式发行,由卡米拉·T. N. 索伦森与约恩·德尔曼担任编辑。这本书为丹中双边关系在具体和总体层面上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从一个整体的、理论性的角度来看待丹中伙伴关系。

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引起广大中国读者的兴趣,无论是科研和教育领域还是公共管理和外交领域,特别是那些了解丹麦,喜爱丹麦国宝级诗人、童话作家安徒生的中国人。

在此,丹麦版的编辑要感谢范岁久基金会支持中文版的翻译和出版。我们还要感谢译者王宇辰的出色努力,使本书的中文版具有可读性和实用性。最后,我们要感谢甄建国大使对翻译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约恩·德尔曼(Joergen Delman,丹麦哥本哈根大学
跨文化与区域系教授,中国研究学者)

2018 年 2 月 15 日于哥本哈根

编 者 按

中国让丹麦的政客和商人长了许多白发。对华关系既令人着迷又令人畏惧,既有吸引也有疏离。

丹麦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已有 350 年的历史。一直以来,丹麦对外经济利益驱动着两国关系的前进,直至今天依然如此。现在丹麦有 4 万~5 万的工作岗位直接或间接与对华贸易相关。尽管对华出口总额依然小于对其他一些国家例如挪威的出口总额,但毫无疑问的是,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市场所具有的潜力是无比巨大的。由于经贸关系是丹中关系的核心,因此有人担忧,当今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增长危机,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会对丹麦就业率造成一定的后果。

因此,与当今的中国建立牢固的经贸关系存在着一定的风险,是一种进退两难的窘境。似乎这个国家唯一真正有吸引力的就是国家的体量以及增长中的中产阶层那难以满足的购买欲。

相反,丹麦在中国的经贸政策投入引起了国内政治方面的挑战。丹麦外交大臣不时要向议会和媒体解释说,丹麦不会为了同中国建

立经贸关系而放弃根本价值观。事实上,通过紧密的经贸关系和无数国际表现指标上的出色表现,丹麦有机会缓慢地、一小步一小步地影响中国的正确走向。

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也许将更多受到实质政治问题的影响。中国是否做好准备,承担如气候、发展和争端调解等全球共同问题上的责任了呢?还是说,中国继续坐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后座上,还要求由于在这些领域的最小化投入而得到回报?诸如此类的许许多多问题,将由特约编辑卡米拉·T. N. 索伦森以及约恩·德尔曼在本书中解答。

马丁·马库森(Martin Marcussen)

责任编辑

《经济与政治》

译者说明

本书是丹麦政治学 and 经济学领域的顶级学术期刊《经济与政治》杂志的特刊,首次以“中国特刊”的形式集中收录了以中国和中丹关系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学术性文章。本书所收录文章的作者中既有丹麦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知名学者,也有多年从事中丹外交和经贸工作的资深从业者。本书所收录文章所覆盖的学科和行业非常广泛,既包括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领域,也涵盖了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新闻传播学等学科。既有严谨的理论研究性文章,如政治学领域的关于丹麦外交和安全政策行动主义的文章,也有以实务经验为基础的实践研究性文章,如前任丹麦驻华大使撰写的全面深入地剖析和评价中丹关系的文章,还有以具体项目为主要内容的案例分析性文章,如对中丹中心进行分析和总结的文章。

通过阅读本书,读者能够全面了解中丹关系和丹麦对华政策的历史渊源、当今形势和未来发展趋势,是一本内容全面而深刻的学术性著作。本书对于中国国内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的研

究者和从业者,特别是对于那些专门从事丹麦研究和北欧区域研究的教学和科研人员具有极强的研究和参考价值。

王宇辰

2018 年 3 月

目 录

序	约恩·德尔曼	001
编者按	马丁·马库森	001
译者说明	王宇辰	001
引言	卡米拉·T.N.索伦森、约恩·德尔曼	001
——丹麦对华政策：从出口问题和丹麦工作岗位到新世界秩序		
丹麦采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	卡米拉·T.N.索伦森	011
——行动主义在中丹关系中所面临的挑战		
案例一 从政治人权原则到企业社会责任中的商业		
实用主义	卡琳·布曼	029
丹麦对华关系新动力	约恩·德尔曼	041
——战略性政府间合作		

案例二 中丹中心及丹中功利观	马丁·贝克 065
案例三 议会监察专员署与中国的合作 尤纳斯·贝灵·李斯贝格、克里斯钦·欧高	073
始终以贸易为中心	曹伯义 083
案例四 来自中国的进口竞争及其给丹麦企业和 员工带来的后果	达蒙·阿诗尼亚、雅各布·蒙克 101
从中国到丹麦：百年间的移民形式 梅特·图诺、斯蒂·图尔森	109
丹麦新闻中的中国：媒体并不总是鼓掌	劳拉·当布劳斯基 125
丹麦与中国双边关系历史发展沿革	裴德盛 139
附录 1 外文缩写	153
附录 2 大事记	157

引言

丹麦对华政策：从出口问题和丹麦
工作岗位到新世界秩序



卡米拉·T.N. 索伦森 (Camilla T. N. Soerensen)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政治系 讲师

约恩·德尔曼 (Joergen Delman)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跨文化与区域系 (ToRS) 中国研究教授

“‘中国’以经济和政治大国的身份回到了国际舞台上，我们其他人不得不更要让自己去适应由于变换的力量平衡而产生的新的国际秩序，无论是好是坏。”（丹麦驻华大使戴世阁，《日德兰邮报》，2016 年）

本书将分析和讨论近年来丹麦对华政策的发展。焦点将放在从历史角度看待丹中关系中的丹麦维度，以批判性视角来评价丹麦从大量对华投入中取得的产出，以及丹麦在对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

丹麦对华政策的目标和框架条件

丹麦外交和安全政策的目标是促进丹麦的安全、利益和价值观。在对华政策方面，为了应对近年来国内和全球范围内条件和要求的变化，在这三个总目标之间的权衡也随之发生变化。丹麦外交和安全政策的价值基础以及丹麦对华政策是由一系列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价值观组成的，如民主、人权、自由贸易以及经济、社会 and 可持续发展

展。在行动主义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中，特别是自 1989 年以来，促进丹麦的价值一直处在中心位置，但这一点在对华关系上经受着越来越多的考验，尤其是当丹麦的利益更加倾向于跟中国保持强有力的甚至是无条件的参与和合作。

实用主义主导着当下的丹麦对华政策，但是这一点正在面临与日俱增的压力。这尤其归因于中国在推行国内政治中的强硬路线，以及中国开始在国际上更加独立和积极的行动，日益挑战着美国——丹麦的紧密盟友。这些因素加剧了丹麦总体外交和安全政策上面临的窘境(索伦森)。同样，由于对中国的巨大投入的商业或公共价值成果持续的不确定性，给正在施行的政策带来了压力(德尔曼、贝克)。这是丹麦在中国的包括资源消耗在内的密集投入的合法性的核心，尤其是自 2008 年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丹麦对华政策是在最大程度上为促进丹麦的经贸利益服务。

丹麦对华政策聚焦经济贸易领域并不是什么新闻——在过去的 350 年里一直如此(曹伯义)。尤其是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直强力聚焦于防止经贸关系受到限制，或者完全错失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所带来的机遇。然而，尤其是在最近的 20 年，历届丹麦政府同时还不得不处理对华关系中棘手的政治问题。丹麦同时也受到国际义务以及特别是美国这样的盟友的制约。

因此，历届丹麦政府不得不常常在对华关系中作出艰难的战略选择，其中，丹麦早在 1950 年初就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丹麦与“新中国”关系中第一个重要的战略选择。在此之后，丹麦对华政策多次被重新评估。

1997年,丹麦与中国领导人就人权问题进行批评性对话,随后与中国政府之间开展了一系列具体的人权领域题目和项目的合作,这当中也有多个丹麦组织的参与,包括“人权协会”和“救救孩子”。然而,这一批评性对话以及与中国关于人权相关问题的总的对话在近年来被部分移交给欧盟(索伦森)。

丹麦不是唯一一个在对华关系上陷入两难之境的国家。欧盟国家一致认为,欧盟应该在更高程度上承担起这种批评性对话。与其他欧盟国家相比,丹麦对华政策的不同之处在于,自2008年开始就有意识地选择与中国全面合作,包括人权领域在内,通过与中方伙伴在各个层面开展具体合作和项目,从长远角度来寻求改变中国,与此同时,这种批判性对话更大程度上被“第三方”参与者承担,如议会监察专员(贝灵·李斯贝格和欧高),人权协会,或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机制由企业承担(布曼)。同样,在提升中国投资体量和中国赴丹麦移民人数方面也有所投入。今天,丹麦已经有了许多中国学生和学者,长远来看将为中国和丹麦的发展以及加强双边关系作出贡献(图诺和曹伯义)。丹麦的市/大区与中国省/市之间的低级别的联络和互动在这些年来也与日俱增。

自2008年以来,政府间合作尤其处于丹麦对华政策的核心地位,针对丹麦政策中的“价值输出支柱”的论据是,与中国在各层次和各领域加强合作能够为更多“出口”丹麦解决方式和丹麦模式打开大门,也是在中国推行人权的最好的方式。理性地来讲,中国的人权状况的改善只有在长期的中国内部压力和要求之下才能实现改善,因此丹麦也必须与中国开展长期的合作。

中国政治制度——持续和变化

丹麦的政客、外交人员和商人在中国跟什么人谈判和合作？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今天拥有八千五百万党员的共产党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平行的党政机制，应用于各个行政层级。这一特点基本延续至今。也就是说，中国的治理始终是建立在双重层级制度基础上的，共产党事实上在各个层级上都掌握着最高权力，统筹意识形态和政治治理，而政府和政府机关，或者常常是共产党自身，负责既有政策的贯彻执行。绝大多数政府机关的高级别领导都同时是国家或地区高级别的党员。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被称为一党制。

除此之外，从最初开始也建立了一系列机构，例如工会、妇女联合会、青年团等，以消除同广大群众的距离，并将其组织动员起来。这些组织依然是隶属于党，行使建议功能。通过在所有工作单位、农村地区建立了党委，党组织遍设于整个社会，而中国社会中新兴的组织、个人和团体迅速被划归于党之下。

为了能够驾驭这种复杂的中国政治体制，一系列非正式机构和协调机制得以诞生和发展。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所谓的领导小组。在国家层级上，所有关键的国内和外交政策问题上都有领导小组，其中最重要的小组由一位政治局常委领导。在低层级上也存在这样的领导小组，事实上，党内最重要的党政领导，政府，个别情况下还有军队，三者共同聚在这样的小组中讨论并做出决定。

这个制度常被称为“分权”。这是一种高层治理体系,但政治和经济政策及其实施也会经历辩论和内部竞争。因此,高层领导人之间的谈判、社交网和共识的达成对于这种竞争的成效以及能否得出理性的结论至关重要。同时,这也是一个极为专业和体制化的政治制度,能够培养一批经验非常丰富、富有竞争力和谈判能力超群的领导人,这些人首先要在不同省份和国有企业里任职,经历漫长的职业生涯。反之,这样的领导形式也限制了领导人自身的个人背景和特点所具有的意义。

党在社会中的作用以及对于社会的控制在近年来承受着重大压力。随着市场化改革、放权和社会发展,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政府控制日益减弱,而对于公民社会的外部伙伴,尤其随着社交媒体的应用,变得更加具有政治驱动性。

党政体制的复杂性和非透明性伴随着数年来的经济增长共同为腐败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党、政府和军队的某些高层领导及其家属获得了一些生财之道。这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不满。因此,反腐败及重新建立党的道德和对人民的忠诚成为当今领导人为赢得人民的支持和对党的信任的运动的运动的重要部分(贝灵·李斯贝格和欧高)。

丹麦与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成果和展望

阿纳斯·福格·拉斯穆森曾大力加强与中国的交往与合作,并